

《盛世危言》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郑观应《盛世危言》出版一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侧记

张中鹏

清末民初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期。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往何处去”的思考与实践,揭开了百年嬗蜕的序幕,亦昭示着社会变革的走向。作为“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的最先觉悟者”,郑观应通过《盛世危言》首次完整地提出系统性的改革主张,在当时积弊日深的清朝引起轰动效应,也为后世探索国家出路提供了历久弥新的思想资源。近年来,伴随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改革话题引起热议,《盛世危言》研究再度回温,成为学术界一个令人瞩目的焦点。2014年8月14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近代史研究》杂志社在澳门合办“纪念澳门回归十五周年暨郑观应《盛世危言》出版一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二十余名来自中国内地和澳门的近代史专家,围绕“《盛世危言》的版本、流传与影响”、“《盛世危言》与中国发展道路”、“郑观应与近代中国社会”等话题展开讨论。这次会议开拓了新的史料、议题、视角与方法,推动了相关研究的纵深发展,为近年来《盛世危言》乃至郑观应研究的一次系统梳理和提升。

一、学术史视野的新认识

如果从1944年胡秋原发表《郑观应及其〈盛世危言〉》一文算起,郑观应及《盛世危言》研究迄今已历70年。据《郑观应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统计,截至2009年,国内外共发表相关专著、论文、资料456篇。其中大多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90年代有104篇,进入21世纪以来骤增至262篇,占半数以上,整体呈不断推进和扩张的趋势。在所涉领域上,早期

研究主要围绕郑观应的政治和经济思想、实业与政治活动,后逐渐拓展至其生平、家世、交谊、思想等方面,涵括军事、外交、法律、文学、宗教、新闻、教育、慈善诸领域。近年来,从学术史角度梳理郑观应及《盛世危言》研究,在更高起点和整体视野上摸高探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王杰、倪俊明、刘桂奇等撰文分门别类回顾学术史,并在总体上对其成就、趋势、问题及启示予以评述。在本次研讨会上,徐秀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通过系统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郑观应及《盛世危言》的研究历程,指出这一时期研究特点具体体现为:第一,研究起点较高,后期研究主要表现为广度的拓展;第二,议题广泛,重要议题均已达致集中且深入的探讨;第三,争议问题不多,基本未形成交锋。陈才俊(暨南大学文学院)则通过对清末至今《盛世危言》研究史的纵向考察,依据主题、方法和特征将之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下半叶、21世纪以来,并指出“全方位”成为新世纪研究的最显著特色,即研究成果、视域、深度均显著得到扩宽和提升,传统研究领域日益深化,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新的史料不断开掘。

如何看待近三十年郑观应及《盛世危言》研究热的持续上升?徐秀丽认为,1980年以来郑观应与《盛世危言》的学术关注,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及史学范式的转化有着内在关联,“纪念史学”某种程度上因聚集效应成为推动研究深入的契机。任何研究领域的兴衰升降,虽取决于其学术内涵和价值含量,但同样受制于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以往郑观应和《盛世危言》研究长期得益于上海和澳门政府及两地学术界的推动,研究力量亦主要集中于两地。如1992年由澳门中华教

育会、澳门中山三乡同乡会、澳门历史学会合办的“纪念郑观应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是国内首次召开的郑观应专题学术会议。此后，学术界相继召开郑观应诞辰155周年、160周年、170周年及逝世80周年纪念会。这些会议均由澳门政府或民间力量发起，且主要在澳门举行。不过，这一背景使以往研究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从而凸显国内外学人参与广度不足，亟待来自不同地域和领域的学者介入，带来研究资料、视角和方法的更新。

二、关于成书、作者、版本之补正

改革开放后的近代中国研究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都充满争议，评价两极化，但这一情况似未出现在郑观应及《盛世危言》研究上。不过，在《盛世危言》作者、版本及成书过程等具体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1. 《盛世危言》之作者及家世

郑观应是《盛世危言》作者，这一点本无歧义纷争，但由于成书过程复杂，又屡次增订重刊，故自清末民初以来，有关作者的质疑之音不断，社会传言《盛世危言》乃情人捉刀之产物。实质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论证《盛世危言》作者是否郑观应，而在于探讨为何会出现作者另有其人之说法。赵利峰（暨南大学文学院）以《盛世危言》由吴汉涛、劳宝胜、何启与陈少白所撰的三则传闻为例，通过辨析其缘起、流变及成因，指出造成这种“纷说”的主因在于《盛世危言》大量摘录他人著述，且成书过程中多人参与编辑润色。按现代著作体例来看，《盛世危言》应为“编著”。汤开建（澳门大学历史系）通过勘比现存文物与文献，推翻郑氏“世居澳门”之说，确认19世纪中期郑观应之父郑启华始移居迁入，迅速崛起并跻身晚清澳门最具实力的华商之列。新发现葡萄牙东方艺术博物馆所藏1880年澳门绅商《恭颂大西澳澳门总督吧唎喇咕子爵施大人德政》锦旗，由华商何贵、冯成、曹有等十余人联名赠送，郑启华位居第六位，郑氏家族之显赫可见一斑。对郑观应家世的探讨不仅有益于深化郑观应生平研究，而且也应成为研究近代澳门经济史、华商史的典型样本。

2. 《盛世危言》之版本

作为“近代中国版本最多的名著”，《盛世危言》前后翻刻出版20余种，且卷次不同、内容各异。版本之多，流传之广，殊为罕见。正因如此，版本问题给时人及后世造成诸多困惑。学术界虽已考定甲午本、乙未本、庚子本出自郑观应亲定，但其他数种却难以确考，

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后人的文献利用及对郑观应的评判。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亟待从文献学角度对现存和已佚各版本进行全面分析，考定刊刻年代，整理版本系统，厘清源流嬗变及纵向、横向联系。《盛世危言》的历次修订均有其特殊的考量。如近期关于郑观应在东南互保时期社会活动的研究，发现郑观应在维持东南互保格局上多有建言，这一时期郑观应的政治观察和政治参与，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盛世危言》的文本修订，尤其体现在庚子年“议院”等篇的补写和增订上。陈丽莲（澳门博物馆）则提出郑观应的诗集本质上乃《盛世危言》韵文版，两者内容相近，通过以诗证史、以史论诗，对于重新梳理《盛世危言》的版本和内容，不失为一个重要切入点。

三、接受和传播研究的新取向

《盛世危言》之所以成为经典，最核心的原因在于郑观应深邃的学理思想和对时局的思考。与会学者指出，时势虽是阅读热出现的一个外在条件，但文本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才是其广为流传的内在根源。彭南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认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从一开始便以“政治正确”的姿态，与国家和民族建立联系，从而获得出版和阅读的合法性。此外，它的出版搭上了甲午战后“阅读革命”的顺风车，获得了千千万万国人的青睐，进而形成一种“盛世危言”的集体心态。这一认识更多从技术变革、士风流变出发，阐述《盛世危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在一种不断建构与再建构的历史场景里，成为既往、当下乃至未来需要继续探讨和研究的主题。武吉庆（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引入“言说策略”的概念，揭示郑观应著书立说背后的苦心孤诣，及遣词造句上的刻意而为，指出其目的在于赢得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接受。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盛世危言》接受和传播的研究，目前已经处理了“为何传播”的问题，却未彻底解决“怎样传播”的问题。据笔者浅见，依据藏书或出版发行目录，或可寻绎文献的传播路径。即利用公私机构所藏书目和出版书目，如《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民国时期私家藏书目丛刊》、《民国时期总书目》、《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民国时期发行书目汇编》等，考求《盛世危言》的版本、递藏和流传。

四、郑观应生平与思想探研的深化

近年来，随着上海、澳门、里斯本等地所藏郑观应

相关档案、碑铭、兰谱、书札、日记、诗集等文献的系统整理刊布,关于其生平、交谊、事功乃至思想研究,均较以往更趋细化,呈现出新的动向,尤其在其维新思想和社交交往两个方面颇有集中体现,引起与会学者的关注。

谢放(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郑观应的“体用”、“道器”观作进一步梳理和探讨,指出作为晚清学人特有观念的“中体西用”思想,在具体表现上分际明显。郑观应坚守儒家的中和之道,提倡因应时势,吸纳“西艺”、“西政”,实行变法。这一认识实质上注定堕入“牛体马用”的悖论。“商战”是郑观应的核心思想,以往研究注重对其商战思想的背景与内容、意义与影响的评述。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通过对19世纪后期中外商贸、国内市场、消费生活变动的分析,考察洋货流行与商战思想之间的关联,认为洋货流行的视角与具体理性的市场分析,为郑观应“商战”思想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学理依据。何志辉(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则以“君民共主”、“商务兴国”和“旧律变革”三个论题为据,探讨郑观应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意义。继续在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法制史层面考察郑观应精神世界,达致“见之于行事”,让思想回归历史,仍有不少深入分析的可能。

历史研究的中心是人,人际交往则是社会建构的关节。面对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研究者更应注重循着人际线索,探求人物心迹和事实本相,不仅能够多方位地考察历史人物思想发展历程,更能深入理解研究对象的时代性和地域性。郑观应经历跌宕,饱经世故,关系广泛,交游涵括政、商、学、军、宗教各界,遍及粤港澳、京津、江浙乃至欧美。学术界对郑观应关系网的考察,或以人物为中心勾勒郑观应的交往网络,或以事件为中心阐述交往内外的复杂面相。本次研讨会上,研究者或阐述《盛世危言》传播、洋务实业经营等核心环节,或分析郑观应及其家族的人际圈,或考察作为修道者郑观应的神缘关系,或在诗集研读基础上尝试还原其晚年的社交联谊。郑观应洋务实业经营以沪港为中心,社会活动集中于香山、上海、广州、港澳等地。澳门对于郑观应的意义,不仅是避难隐居、著书立说的短暂羁留之所,且是郑氏家族的兴起之地,但学术界关于郑氏家族与澳门关系的研究仍显不足。汤开建通过梳理郑观应与澳门华商何廷光、卢九等家族的交往,指出这些交往延续乃至加深了居澳华商内部的关系,巩固了郑氏家族在地方上的社会地位。殷实的家境、广泛的人脉,为郑观应的成长提供了重要基础。在洋务集团内部交往上,曹天忠(中山大学历史系)选取1896年至1898年汉阳铁厂经营的侧面,否定了学术界关于郑观应离职缘于其任职前言论上批评开罪张之洞的说法,指出实则是因为郑观应和盛宣怀在联手整改铁厂弊端过程中遭遇重重阻力,尤其是在连锁经营理念上与张之洞产生龃龉与冲突。彭南生则从《盛世危言》的流播与评价入手,结合《盛世危言》序跋题写者、荐举人、读者受众的网络分析,厘清了《盛世危言》阅读、接受和传播的脉络。

除此之外,与会学者还就郑观应的文学修养、历史定位等问题提出新见。如关于郑观应历史定位问题,夏东元认为其具有四重身份:买办、民族资本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洋务企业经营者。李长莉则主张兼顾郑观应的身份与思想,提出“商人思想家”的新定位。

五、余论

历代学者关于《盛世危言》的研究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但与其独特的内涵和影响相比,仍有不少深入探讨的空间。与会学者认为,在目前丰硕成果的基础上精进,尤其必要。一方面是深挖,就某一专题进行打井式探究;另一方面即广拓,避免就事论事,应以郑观应及《盛世危言》为轴心实现相关人和事的勾连考察,在问题的脉络和谱系中,呈现其人其事及各种复杂关系。结合以往研究的取向和趋势,笔者认为至少有必要从以下几方面拓进:文献整理与考辨,题材选取及其与时事之关系,文本渊源、传播与接受。可从著作之外的文献学研究切入,深化郑观应家世生平、《盛世危言》成书过程和版本源流的钩稽考索,也可从著作内部进行文本分析,厘清郑观应及《盛世危言》的思想渊源、主题旨趣、舆论反应及社会影响。令人欣慰的是,为搜集、整理、收藏和研究相关档案文献,继2005年澳门郑家大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成立澳门郑观应研究中心,澳门文化局也即将筹建郑观应文史研究中心。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郑观应及《盛世危言》研究能够更上层楼。

[作者张中鹏,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广州,510006,zzpwh1983@163.com]

(责任编辑:徐秀丽)